

福建协和大学

This book is subsidized by the Henry
Luce Foundation in U.S.A.

本书出版得到美国亨利·鲁斯基金会的赞助

珠海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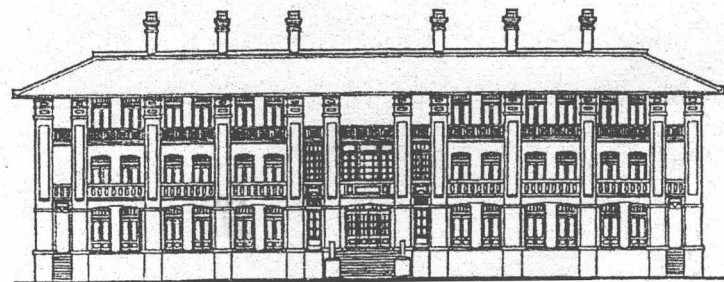
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

主编 章开沅 马敏

福建协和大学

罗德堡克·斯科特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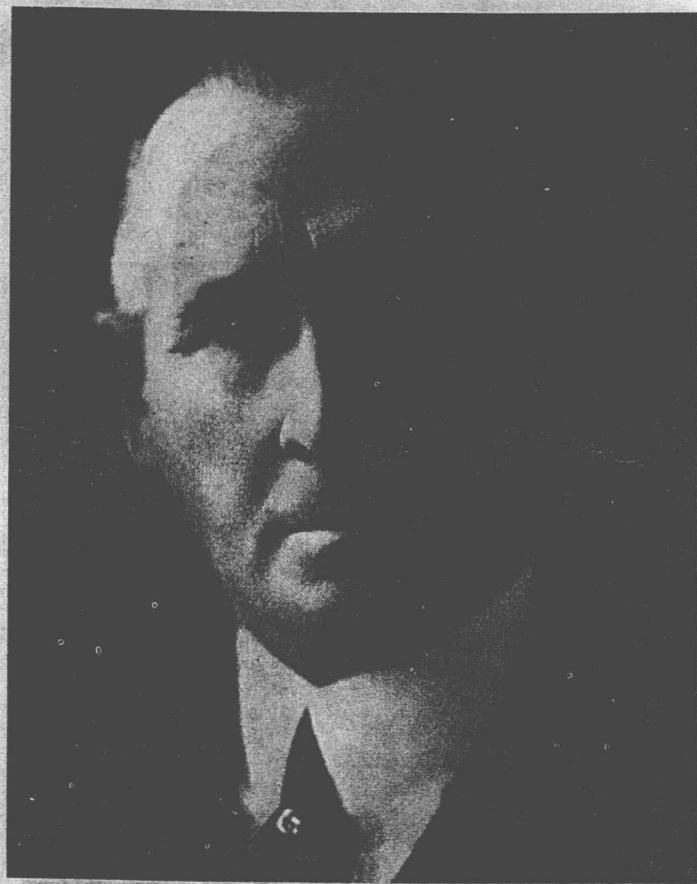
陈建明 姜源 / 译





庄才伟校长, 1916—1923 年

冰原新刊, 1927—1947 年



高智校长, 1923—1927 年



林景润校长, 1927—1947 年



陈锡恩代校长, 1946—1947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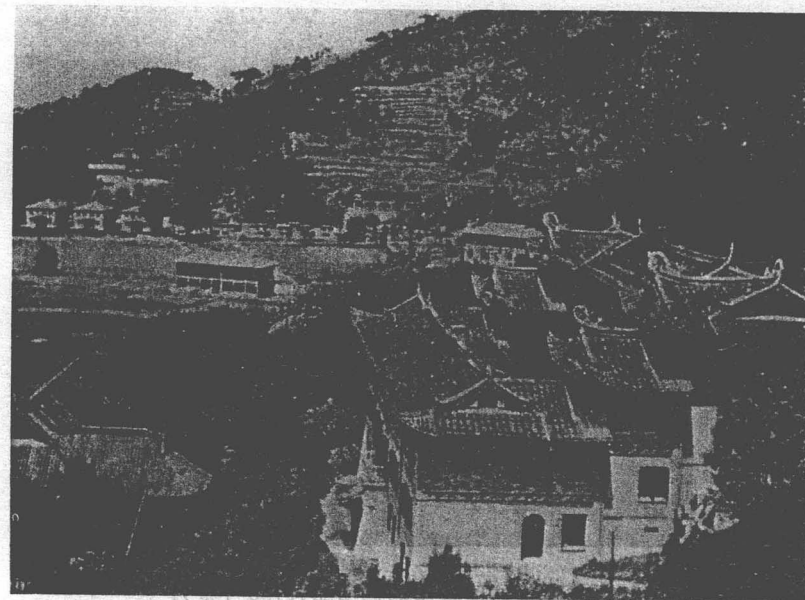
在邵武的部分教职员工, 1938 年



在邵武举行的毕业典礼, 193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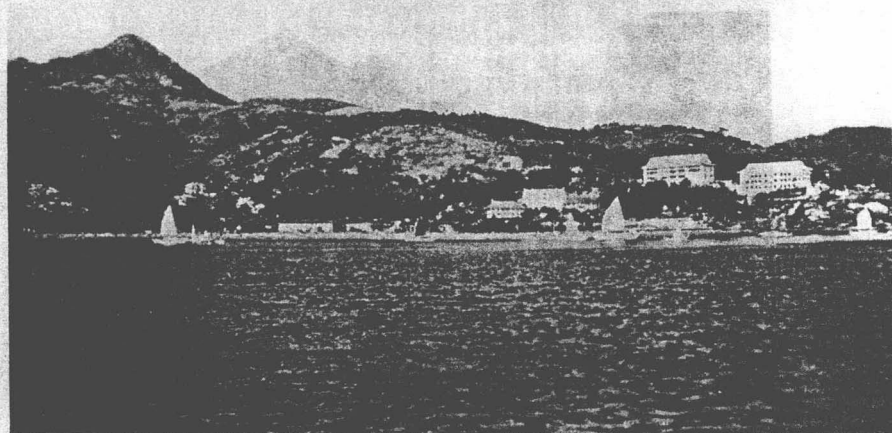


俯视闽江的福建协和大学校园



第四章 发展计划 男生宿舍和大学实验田

(57)



鼓山侧的校园



紧靠教职工宿舍的实验田

总序

- (1) (1901-1911) 第一章
- (2) (1912-1919) 第二章
- (3) (1920-1929) 第三章
- (4) (1930-1939) 第四章
- (5) (1940-1949) 第五章
- (6) (1950-1959) 第六章
- (7) (1960-1969) 第七章
- (8) (1970-1979) 第八章
- (9) (1980-1989) 第九章
- (10) (1990-1999) 第十章
- (11) (2000-2009) 第十一章
- (12) (2010-2019) 第十二章
- (13) (2020-2029) 第十三章
- (14) (2030-2039) 第十四章
- (15) (2040-2049) 第十五章
- (16) (2050-2059) 第十六章
- (17) (2060-2069) 第十七章
- (18) (2070-2079) 第十八章
- (19) (2080-2089) 第十九章
- (20) (2090-2099) 第二十章

总序

章开沅

教会大学曾经是中国新式高等教育的先驱。到1882年,至少有一所中国教会学校已经具有高等教育(Post-Secindary)性质。12年以后,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年(1894),教会在中国创办的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学院(College)已有四所,迄至1950年,教会大学增加到14所,另加两所学院,学生总数13 000人。其中两所在华北,三所在华南,七所在华东,两所在华中,一所在华西,一所在东北,其辐射力基本上覆盖全国。

中国教会大学诚然是与西方殖民主义相伴而来,并且其初始阶段又主要是为基督教的传播服务。但到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民族主义浪潮的猛烈冲击下,中国教会大学不能不作相应的自我调适,经过本土化、人间化、学术化的艰苦历程,逐渐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本世纪30年至40年代,中国教会大学曾经具有较高的成就与国际地位。他们与非洲的教会学校相比,显然处于较高的层次;与印度的教会大学相比,为数虽较少而质量则较高;与日本的教会大学相比,则具

有较强的与公立大学竞争的實力,因为他们在医学、农林、法学、商学、社会学、新闻学、图书馆等学科领域,都具有无可置疑的优势。

根据 1937 年的统计,在 10 000 个中国教会大学毕业生中,3 500 余人从事教育(其中 2/3 执教于教会学校),500 余人从事宗教与社会工作,100 余人任牧师,近 700 人从事医务工作,300 余人以法律为业,近 900 人服务于公用事业,经商者则为数甚少。1936 至 1937 年期间,还有 1 100 余名毕业生继续深造于研究所或成为研究人员,其中有 300 余人留学海外。由此可见,教会大学虽有宗教背景,但毕业生从事神职与其他专职宗教工作者人数并非甚多。大多数毕业生都是服务于世俗社会各个层面,或从事较高层次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但是由于人们所已熟知的中国教会大学内部和外部的种种原因,他们于 50 年代初从此绝迹于中国大陆。正如曾在金陵大学任教的芳威廉博士(William B. Fenn)所说:“建筑和设备依然留存,教师可能在新的学校任职,但教会大学从此消逝。”然而,芳威廉的结论并非全然消极。他说:“教会大学的贡献,是培养了一大批有良好训练且在社会各层面有很大影响的男性和女性,而这正是国家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中国教会大学的重要贡献还在于增进国家之间相互了解与友谊。通过学校提供的语言、知识、价值和外国教职员,引进了西方好的东西。同时,也通过他们,中国的知识被翻译和示范而介绍到西方。他们担任精神的和文化的使节,协助向东方解释西方,向

西方解释东方,虽然受到帝国主义的牵连和外洋性格的妨碍,作为西方文化的介绍者,他们参与了中国文化、社会 and 政府的伟大革命。”(《教会大学在变革的中国》)

当然,中国教会大学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绝非三言两语所能讲得清楚,而且评论者由于各自的社会文化背景,其视角与评判标准也必然各有自己的特点。但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即对于在中国存在半个世纪以上的这一特殊教育群体,必须认真加以研究,包括其正面的与负面的社会效应及历史经验,否则就不可能对中国近代教育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获致全面的理解。

我们对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起步甚晚。90 年代以来情况虽有所改善,但内地学者对海外西方著作与档案文献的了解仍多局限。为了推动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进展,我们决定出版《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丛书》,把国内外有代表性的相关著作与文献陆续介绍给研究或关心这一课题的读者。我们首批编辑付印的共有十本书。其中有三本是国内学者的学术专著,即董黎的《中国教会大学建筑研究》,史静寰的《从狄考文到司徒雷登》,徐以骅的《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都是颇有深度的力作。其他七本则译自从 1954 年开始由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主持编写出版的系列丛书,包括福建协和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之江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华中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华西协合大学。这系列丛书虽然缺乏足够的研究深度,但由于作者大多曾在各个教会大学工作,而且有些人还

作者介绍

罗德里克·斯科特(Roderick Scott 即徐光荣)是哈伍福德大学文科学士、硕士;哈佛大学文科硕士;太平洋宗教学院神学博士;南加州大学哲学博士。他前往中国之前,曾任鲍登学院和奥伯林学院讲师,厄尔翰学院助教。1913至1914年,他在俄国以基督教青年会成员名义提供服务。1916年,他受美国国外布道团长董事会的派遣前往中国,并从1917至1949年在福建协和大学任教师兼管理人员(他是在该所学校里服务最长的成员)。最初,他教授英语作文,后来,又教授哲学。1920至1930年,他任大学教务长;其间,他培养了两位中国人接替他的职位——陈锡恩(Theodore H. E. Ch'en)和T. H. 郑(T. H. Cheng)。他曾两次出任代理校长:一次是1919年,庄才伟校长离校期间;另一次是高智校长离校的1924至1925年之间。在1947至1949年的艰难岁月里,他又出任副教务长。太平洋宗教学院在授予他荣誉神学博士时,写下了这样的评语:“罗德里克·斯科特,精力充沛的基督教思想的解释者,沟通了非基督教徒的中国知识层;古代文化与新型文明冲突中的思想家和工作者;努力将两个伟大民族联系起来的传教士。”

任职甚久,他们对教会大学历史情况的陈述比较起来更贴近于当年的实际。即令是作者所固有的某些西方偏见与宗教立场,也可以增进我们对于教会大学及其外籍教职员的理解。

我认为,这套丛书的出版,必将有助于读者对中国教会大学获致比较完整的印象,也多少可以为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提供方便。但是,我又必须指出,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现今已有许多新的可喜的进展,保存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的中国教会大学档案文献早已全部公开,国内各地收藏的相关资料也得到日益深入的发掘与利用。有志于这一课题研究的年轻学者,需要把这套丛书作为必要的参考和入门,然而却决不可为这些作者的陈述与解释所束缚。应该更为艰苦地深入发掘大量确凿的原始资料,进行多视角和多层面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的独特而有价值的见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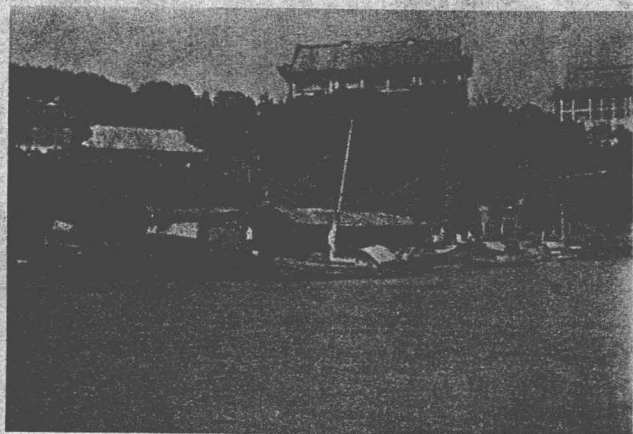
这套丛书是一个公开的园地,我们期待着更多的研究中国教会史的学术佳作刊行问世!

福建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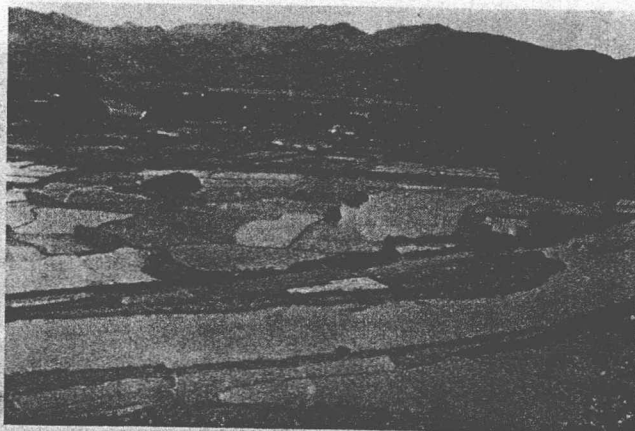
福建协和大学坐落在福建省省会福州市。福建省位于中国南部海岸,在纬度 24° 至 28° 之间,面积几乎与纽约州相等。该省三面环山,故此常与中国其他地区分开。福建省在唐朝就获此名,意为“已建立之幸福”;宋朝时,由于儒家理学大师、著名哲学家朱熹曾居住南平,福建省一度成为全国文化中心之一。13世纪时,马可·波罗游历了福建,并在其游记中描述了该省的若干城市。

福建省山丘连绵,交通不便,人们讲不同方言。闽江起源于福建西北,向东南经福州流入大海。福州位于北纬 26° ,与台湾岛北端隔台湾海峡相望。所以,在与日本交往中,福建是继满洲之后第二个重要地带,过去来自英国和新英格兰的船只常常停泊福州,运输茶叶。福建省的第二大城市厦门坐落在该省南端,是南海的水运和商业中心。

福建省出产茶叶、大米、糖、漆器、樟脑、木材、水产、柑桔和桐油。西方人特别喜欢那里的五夷山茶、福州漆器和德花白瓷。当地人以独立、聪明和精力充沛著名,



迁校至邵武时使用的机动船,1938年5月



稻田后面的邵武新校园

田畝與油金甯王廟神像

目 录

总 序	(1)
作者介绍	(1)
福建简介	(1)
第一章 与一个幻影抗争	
(1911-1918年)	(1)
第二章 办 学(1919-1923年)	(22)
第三章 进 步(1923-1931年)	(36)
第四章 发展壮大(1932-1937年)	(57)
第五章 战争年代(1937-1945年)	(94)
第六章 战后大学(1945-1951年)	(114)
西方籍教职员工名单	(151)

是继广东省后散居世界各国第二多人口的省份。侨居国外的福建人主要集中在马来西亚、菲律宾、爪哇和婆罗洲，从这些地方回流的资金促进了福建人民文化经济的新生。

第一章 与一个幻影抗争 (1911 - 1918 年)

“教会大学美妙得不像是真实的”(J. W. BUCKHAM)[1]

假如美国和英国的教会大学美妙得不像是真实的，中国和印度的教会大学又能有多少更多的真实性。不论印度的真实性如何，可以说，基督教和教育的密切结合从来没有比在中国更成功的。两千年来，在中国，教育都是特别荣幸的事。[2]

通过几乎不超过 35 年(1910 - 1945 年)的一个时期，中国教会大学增长、扩展并被普遍认可，特别是在几乎根本就没有一所大学的福建有了这么一所教会大学，其原因必然是可以找到的。在基督教的全球扩张中，其他地区无法吹嘘出一个同样的成就。进一步说，在这个时期，基督教在美国大学中实际上衰退了。

可以提出三个原因：首先，在义和拳叛乱后出现的伟大的灵性解放中，教会大学参与了所有其他的基督教运动和改革运动，包括辛亥革命自身。就像一个木塞破裂了，改革者[3]复杂的理想主义和传教运动似乎突然准备

在全国泛滥开来。停止围攻使馆(1900年)一年内,传教工作又开始进行,10年内,基督徒数量增长了一倍。【4】的确如此,之后的辛亥革命失败,儒教几乎灭亡,教会人员的比例也有所降低,但出现这些情况有着充分的历史原因;他们不否认这种说法,即本世纪前30年是基督教事业空前进步的时期。

教会大学【5】得以成功,并被中国公众乐意接受的第二个原因是它将西方世界引到了中国的门槛。他们的校园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西方文化重要价值的范例,这是东方正在追求——无论如何笨拙——的东西,即科学和民主。西方给东方民主政治,但如此投资于民主政治也是在为西方自己干事情。教会大学还带来设立大规模组织的习惯和训练有素的管理大型机构的人,而这些是前所未有的。【6】它们还在学生中培养做人的品格,因为它们知道学生正在努力的方向,于是在年轻的共和国需要效忠的思想混乱中提供了可靠的指导。过后它们受到了具有良好设备和可获得政府工作的中国公立大学的挑战。当然,教会大学在教英文方面占有优势,这对美国和英国的学校是个秘诀,但由于教会大学把教育从宗教内分离的倾向,使它们常常并不明显地比公立大学好多少。

第三个且更微妙的原因存在于某种由教会机构取得的有创造力的结合之中,它求助于中国人的心灵。他们能在自己人中将传教与革命、基督教与儒家思想结合起来。【7】首先,他们能够预言革命将走向何处。1934年林景润校长在美国发表的演说中说:“理解自己的民族是

学校的责任。”这样,教会大学在某种程度上能将革命潮流引向文化,而不只是政治和经济目的。这个实践过程促使各教会以伦理的而不是宗教的措辞解释他们的教义,毫无疑问,许多人是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所讨论的观点在本土很流行。这个民族的大部分由于信仰枯竭——即使没有完全失去——已失去了同高尚信仰的接触;所以,该实践过程可以辩解为采取了受该民族最小抵抗的方法。当平衡恢复的时候,各教会发现它们在大学中有了坚强的同盟者,准备去保卫和发展教会事业。

第二是基督教伦理与儒教伦理之间的结合。这种结合的完成似乎是由于基督教有些像后来的新生活运动【8】那样,使得一些理想得以复苏。这些理想是古老的儒教所信奉的。一个例子是士大夫,即“士”的观念。在中国,官员是一个学者,因为他必须通过基于儒家典籍的文官考试。这个字起初的意思是“骑士”,孔子将它改变成“学者”,因为官员在思想上像亚瑟王那样总是准备骑马出游,去纠正国家的失误。【9】另一个例子是中国人古老的信仰——历史是人物的而不是事件的相互作用——与基督教所强调的个性培养的结合。我们将发现以优秀人物的涌现为标志的教会大学的历史,中国人尊敬这些人物,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许多这样的教会大学确实受到伟大人物的深远影响。

于是,对中国教会大学来说,他们要求成为那个时代新生的社会力量之一并不过分。很明显,当时在这些大学中作一名教师竟然是一种特权。正如古训所说:“一日

为师,终身为父。”这种荣誉同时落到所有人身上,不论是国民还是外国人。

优势与劣势

较晚(1916年)出现的福建协和大学沿着发展和成功的主要路线,没有太大区别地分享了兄弟学校的上述荣誉。但不幸地是存在某些将它的历史同自身的优势割裂开来的独有特点,当然并非全部特点。

从优势方面来看,这些显著特点中最主要的是福建协和大学是被有意“制造”出来的。它不像大多数兄弟学校那样,从过去的高中渐渐扩大而成,或联合两个甚至更多的现有学院成为一所更大的学校。事实是福建协和大学最初的学生来自福州3所低级学院的两个高年级班,这种合并显得很勉强,以至于它成立两个月后学生发生罢课,要求回到他们各自的学校。福建协和大学的校长们在学生罢课中得到了初期的锻炼。

这种特殊性质的优势是没有阻碍进步的传统和压抑;此外,由于没有可依靠的先例,福建协和大学制定的目标必须被定期地反复检查。它不停地重新考虑其使命,因而总是在为时常访问中国的各种教育委员会做好准备。

由于没有传统的束缚,该校能够做许多教育实验,例如大学生共和国(一种大学生行政管理体制),或者公民福利实践课;【10】能够敏捷地使自身适应专横的政府管

理,例如必须的军事训练;能够更容易地承担“移交”(devolution),等等。移交是教会的术语,描述将权力转交给国民的过程。起初的传教活动必然是家长式的;教堂、大学和医院这些新事物必须由传教士来管理。巴顿和霍金(Burton and Hocking)委员会谴责这种实践,而没有适当地考虑历史实际。当然,家长式统治是一种阴险的东西:我们说,孩子从不打算在这点上仿效父亲!

福建协和大学另一相当独特的优势——尽管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华中大学也享有这一优势——是它处于一座还没有外国化,并且作为文化中心而声誉卓著的城市;可以说,这个新兴的教会大学具有继承古老文化的条件。武昌——“中国的雅典”,华中大学就坐落在这里。武昌使福州相形见绌,但福州自有特性。至少在民族革命时期,这一特性对于福建协和大学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具有同样的价值。该特性还表现在福州素以忠于中央政府而著名,尽管多年面临日本从台湾来的侵袭。中国人称南太平洋为南洋,目前在这里,一半中国学校的校长是福建协和大学的毕业生。具有通向南洋通道的特点也被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广州的岭南大学所分享。

但是优势也许低于劣势。事实上,学校因新建而不为人所知,故缺乏资产和声誉;这样,福建协和大学为了将学生组织起来用了15年时间。

另一方面,开办较晚导致学校在走向正轨前不得不经历大大小小的战争。如果它要发展,它必须“经历暴风雨发展”。【11】福建协和大学建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进

行时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被迫离开其校园。在30年中还有6次其他战争。事实上,几乎没有真正和平的年月。

最后,由于福建协和大学系从无到有,故它的创立者缺乏经验。

学校创办者

为保护学校创办者以及对新建学校进行行政管理的理事会和董事会,必须说明,在福州建立一所大学的意见起初并不是他们提出来的,而实际上起源于爱丁堡城。

1910年伟大的爱丁堡传教士会议在其“与国民生活基督教化有关的教育”的第三次委员会提出:“由于基督教的普世启示(universal message)在教育工作中有一种独特的作用,故应当在世界上各大战略中心设立教会大学。”【12】

按照这个指示,该委员会任命了一个附属高等教育委员会,请约翰·高绰(John Goucher)作主席。就中国而论,“全世界大学”计划要求在四个战略中心设立大学:华北的北京、华东的南京、华西的成都和华南的福州。

爱丁堡会议后不到一年,约翰·高绰来到福州。作为一个将教会大学遍布全球的人来说,他兼有基督教政治家和教育家的身份,是很合适的人选。他出生于1845年,从1884年以来,为美以美会海外传教部成员,1890到1908年担任美国巴尔的摩市女子大学校长。为了向

他表示敬意,1910年这所女子大学改名为高绰大学。他不仅帮助建立了福建协和大学,而且作为董事许多年来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并多次重访福州。

1911年3月25日,响应约翰·高绰的号召,在约翰·高智(John Gowdy)的家中召开了一次“热心于基督教高等教育的人”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福建协和大学得到认可。约翰·高智与该校的财产有长期的联系。

这次会议的发言和讨论应当是有说服力的,因为下面的议决事项得到一致通过:

我们考虑在福建省建立一所联合大学,这不仅是吸引人的,而且是必须的。所有新教派别都可以参加。学校将开设学士、硕士和专业课程。【13】

在福建的6个差会被要求分别任命一名代表,组成两个福建省高等教育筹备委员会,一个针对福州,一个针对厦门,两地相距250英里。在福州有美国公理会、英国圣公会和美以美会;在厦门,有美国归正教会、伦敦会和英国长老会。

美以美会主教柏锡福(J. W. Bashford)所必须说的话仍然是有意义的。在会议记录中有他的这些谈话:

“州立大学的增长(在美国)正在排除各教会学校,特别是芝加哥大学【14】已经危及到所有密西西比河流域小型教会学校的生存。当这一事实引起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的注意时,他创立了普通教育基金,研究小型学院,帮助它们从战略上进行选址。教会学校提供了州立学校缺乏的宗教动力。目前中国的小型教会

学校正面临着类似的情形：公立大学的数量和实力日益增长，在广州教会大学 50 英里范围内的香港大学就是证明。各校董事会无法提供资金使各校互相竞争，或与公立大学竞争；只有联合起来才能保全自己。最后，洛克菲勒可能援助在中国选址合理的联合教会大学，这是很有希望的。”

5 个月后成立了两个筹备委员会，福州的筹备委员会于 8 月 11 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厦门的筹备委员会于 9 月 14 日召开第一次会议。他们讨论了各种标准、教育手段和校址，并定于福州。委员们向几个差会（传教团）报告了对大学计划的总体批准。

根据记录，接下来的三年，即 1912、1913 和 1914 年，有关设置福州大学的计划似乎没什么东西付诸实施。但是，初期学校的财产像通常那样掌握在两个具有远见卓识的人手中。这两个人是福建协和大学最早的“突出人物”，前面已经提到他们。他们的通信表明必须克服的困难是多么的巨大，“逐步发展”是无法避免的。下文将作出他们信件的摘要。

福建协和大学是幸运的，因为在其早期的倡导者中有两个才干出众的人——苑礼文 (Abbe Livingston Warnshuis) 和何乐益 (Lewis Hodous)。苑礼文是美国归正会传教士，被安置在厦门，从 1900 年工作到 1915 年；以后他多年担任国际基督教宣教协会干事职位。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使命首先是捐款给福建协和大学，并且一直是坚定的支持者。1913 年 9 月苑礼文写给董事会的一

封信说明他的兴趣被吸引有多快，在信中他催促董事会“考虑到高等教育作为传教手段的重要性，应在新学校中占据大的份额，目的有两个，一是从普遍意义上教育中国青年，一是防止基督教青年进入带有无神论倾向的公立大学”。于是他概括了在福建设立教会大学的理由。他要求董事会考虑：(1) 在福建省已经作了基督教的开创工作，仅仅在时间、范围和效率上次于广东省。事实上，福建省在全国有最大的教徒数量，在这里分布着中国最老的公理会、最老的归正教会，以及最老的和最大的美以美会教区；(2) 有许多高等预备学校的优势；(3) 作为艾迪 (Eddy) 运动的结果，非基督教学生表现出来的对基督教教育的赞成态度；(4) 基督教学生对高等教育的需求；(5) 最后，费用低。他还可以增加地理上隔离的因数。福建省必须作为一个地方分开考虑。【15】

值得注意的是，苑礼文本应同其他人一道投票赞成将福州作为建议设校的地点，尽管他自己在厦门的使命是很重的，每个城市都具有突出的价值。厦门是一个巨大的商业港口，福州则如上所述，是一座具有文化名声的省会城市。这种文化名声加上福州比厦门外国化程度低，使问题的结果显而易见。

福建聪明的小伙子和姑娘离家到北方或南方城市是一个长期的传统，他们在那里常常获得突出的成功，而他们本应为之服务的家园却衰退了；此外，厦门姑娘和小伙子还在南海寻找职业；除了传教士没有人留在福建！福建协和大学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很快改变了这种局面。

福建协和大学第二位早期的热心人是何乐益。苑礼文与何乐益两人相比,何乐益为学校承担了更大的责任,其原因可以从他生活在福州得到部分解释,他是那里美国公理会的成员,但更主要的是由于他“对联合的热情”。在泛基督教主义这个词发明以前,他就以泛基督教主义的方式进行工作了。当“移交”(devolution)进入词典以前,何乐益就已经为他的传教士伙伴准备好了这个词。关于他一个朋友写到:“何乐益在福州工作了16年,在传教工作中,在指导中国教会和教育政策的移交措施方面,没有哪位传教士人比他更具有影响力。恰如其分地说,就福建协和大学的设想和开创而言,何乐益应当受到高度的赞誉。”【16】

基督教工作互不相关的东西似乎一接触到这个非凡的人就产生了结合。在一封给本国董事会的信中,他列举了正在进行的联合活动。信中还额外增加了一些悬而未决的事情:“宗教传单会(Tract Society)、协和书店(Union Book Concern)、协和医科大学(1911)、协和神学院(1912)、协和高中(1913),一位主日学校的干事、一个协和主日学校协会、一个传教士协会、一个妇女圣经会、一本已付印的协和赞美诗集、协和基督教努力会(Union Christian Endeavor)、协和主日学校课程。计划:协和大学、协和妇女学院、协和妇女学校;一所筹办中的而非实施中的协和幼稚院培训学校。”【17】

如果说1912和1913年在福建协和大学的历史上显得相对平静的话,这是由于何乐益必须使本国董事会接

受他的意见。他显然授意起草了下列的联合声明,因为声明揭示了他以之闻名的进步的传教思想。签名者包括在福州的所有美国公理会成员:何乐益、E·H·史密斯、潘爱莲(Elizabeth Perkins)、约瑟芬·沃克。声明如下:

“我们面临新的机遇和责任;政治革命具有席卷广大民众的理智变革的特征。人民正在勇敢地寻求和接受以前从未有过的新思想和指导。旧思想被粗鲁地遗弃殆尽。我们的教会学校和大学对保存旧思想的精华及指导新思想的吸收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因而这些学校必须增强和扩大。教育一定会成为建立新共和国的基础之一。甚至在辛亥革命以前,我们已经筹划了同圣公会和美以美会同行的联合工作。现在我们强调促使这些计划早日完成的重要性。为了塑造将要出现的新文明,我们必须立刻关注教育工作的进展。然而,我们的力量是如此衰弱以致要取得任何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即使要发出迎接这个挑战的号召也感到勉强。”【18】

与已经摘引过的1913年9月苑礼文给其董事会的信相似,8月何乐益给自己董事会的信也值得一读:

“您关于联合福州教育工作的信在我们发信的同一天收到。我们打算使您相信建立一所联合大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您已经使我们感到轻松。在这方面余下来要做的仅仅是拟定必需品和讨论联合的基础。在过渡时期,我们不能过分强调一所良好的国外大学所具有的必要设备。中国还没有为民主做好准备。我们需要的是一所真正的大学,在这里可以教给学生历史、科学和哲学的